

鲁迅与科普的不解之缘

□ 嵇立平

科海史迹

提起鲁迅,你脑海中浮现的定是他手中那支锋利笔,是他振聋发聩的《呐喊》,是那沉郁叩问的《彷徨》,却未必留意这位以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为己任的文坛巨匠,他的人生行旅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科普脉络。从仙台医专的解剖台到东京书斋的译稿,从杂文里的科学思辨到专门的科普撰述,鲁迅同样以手中之笔在科学传播领域刻下了独特的印记。

解剖刀下的科学启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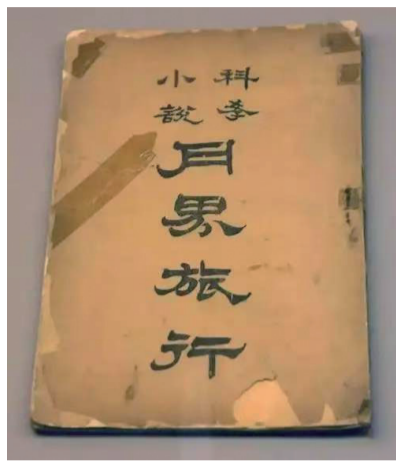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与科学的缘分,萌芽于江苏南京求学时期。1898年,17岁的鲁迅来到南京,先后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学习。在这些新式学堂,他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,触摸到现代科学的脉搏,视野宛如开了天窗。这些知识的种子,逐渐激发了他对科学的兴趣,为他日后致力于科学普及和医学翻译打下了基础。

1902年,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毕业成绩,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。最初他将救亡图存希望寄托于医学,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,系统研习人体解剖学、生理学、病理学等课程。那些对人体构造精细描绘的医学知识,不仅为他打开了观察生命的科学窗口,更培养了他求真务实的认知态度。这段学医经历,成为鲁迅科普思想的源头活水,也让他日后的文字始终带着一种拒绝虚妄的理性底色。

随着学习的深入,鲁迅发现仅靠医



左图为鲁迅,摄于1930年9月。右图为鲁迅1903年翻译的儒勒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《月界旅行》。(作者供图)



学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。当时中国社会的愚昧与落后,国民精神的麻木与冷漠,远非医药可以治愈。据其好友许寿裳回忆,他俩经常探讨“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,及其病根所在”等问题。随后,鲁迅开始思考精神启蒙的重要性,决定弃医从文,将科学传播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另一种“手术刀”。

点亮国人“科幻”之灯

弃医从文后,鲁迅的科学之旅并没有因为转向文学而中断,他的翻译和创作聚焦于传播科学知识。1903年,他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《月界旅行》(今译《从地球到月球》);同年12月,他又翻译儒勒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《地底旅行》(今译《地心游记》)的首两回,发表于《浙江潮》月刊第十期。这两部作品以文言意译的方式,将宇宙

航行、地心探险等新奇的科学构想送入寻常读者的视野。1904年,鲁迅又翻译了《北极探险记》及《物理新论》的部分内容。

1905年春天,他翻译美国路易斯·托伦的科幻小说《造人术》,发表于上海《女子世界》杂志。

在那个国人对域外科技懵懂无知的年代,鲁迅深知有趣的故事远比枯燥的理论更具穿透力,科幻小说里的奇思妙想,恰是点燃科学火种的绝佳引信。因此,他在《月界旅行·辨言》中提出“导中国人群以进行,必自科学小说始”的论断,将科普视为启蒙民众的重要武器。

杂文中的科学光芒

除了翻译科幻作品,鲁迅的杂文与散文,处处流露对科普的独到见解。他

痛斥那些将“科学”当作噱头招摇撞骗的伪学者,也批判民众盲目崇古、排斥新知的愚昧心态。

将科学视为对抗愚昧的利器,且看他《电的利弊》的辛辣:“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,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;外国用罗盘航海,中国却用它看风水;外国用鸦片医病,中国却拿来当饭吃。”他在1918年发表的《随感录三十三》中,狠批“将霍乱病菌实验歪曲为精神改造肉体”的荒唐行径;直言“要救治这‘几至国亡种灭’的中国,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——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”。批判当时灵学等封建迷信思潮,强调唯有真正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,才能救治积贫积弱、思想蒙昧的旧中国。

鲁迅还撰写过《科学史教篇》的科普文章,梳理了从古希腊到近世的科学发展脉络,强调科学“必索真求新,且必察此与人类生活之关系”,呼吁以理性思维审视传统。他在《春末闲谈》里,借细腰蜂捕青虫的生物学现象讽刺统治术,将看似随意的科学引喻,巧妙地嵌入犀利的社会解剖中,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,使科学知识在文化批判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,鲁迅的身影始终穿梭在启蒙的漫漫长路上。他的笔,既写得出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凌厉,也抒得就科普星火的温热。那些散落在墨痕里的科普文字,虽不如他的小说、杂文那般声名显赫,却如点点星火,照亮了国人走向科学与理性的道路。

(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)

世纪追问:“北京人”在哪里

□ 彭韩铭

尚藏技

“‘北京人’的化石标本,在战争中流落何处,尚不可知,这是抗战时期的重大损失之一。”这段沉痛且深情的文字,出自“北京人”化石发现者裴文中先生的珍贵手稿。

谈及田野科考的坚守,便绕不开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传奇往事。1929年12月2日傍晚,北平周口店龙骨山的寒风正呼啸不止,半山腰的洞穴里,昏暗烛光摇曳,25岁的裴文中屏住呼吸,用颤抖的双手捧起一块刚从沉积物中撬出的圆疙瘩。不久后,一封电报从这里发往北平西城兵马司胡同的中国地质调查所:“顷得一头骨,极完整,颇似人!”轰动了整个世界!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,就这样被发现了。

谁能想到,这位因家境清贫、毕业失业流落北平的青年,却怀揣救国宏愿,写下反映故乡战乱苦难的《戎马声中》,被鲁迅誉为“乡土文学之一种”。但生计所迫,裴文中向地质调查所所长

翁文灏求助,才得到周口店发掘工地的杂务工作。初到工地的裴文中毫无古生物学基础,甚至不如熟练的工人懂得分辨化石,可他咬牙自学英文《古生物学》,日夜向专家请教,很快在田野中成长起来。

1929年,周口店发掘的重担落在了裴文中肩上。寒冬将至、经费告罄,他却因发现新洞口不愿停工。腰系绳索下到后来的“猿人洞”底,他不顾寒冷坚持发掘,终于迎来了那历史性的一刻。这份从田野中走出的奇迹,证明了中国学者足以扎根大地、创造辉煌。

然而,战火很快笼罩大地,珍贵的化石面临险境。1941年,太平洋战争前夕,为躲避日军劫掠,北京人化石计划运往美国暂存。裴文中千叮万嘱,悉心安排装箱,可化石在运输途中竟神秘失踪,从此杳无音信。得知消息的他悲痛欲绝,如同丢失了至亲。更残酷的是,三年后,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,侵略者逼迫他交出化石。残酷的折磨让刚满40岁的裴文中两鬓斑白,自嘲“如伍子胥过昭关,一夜须发皆白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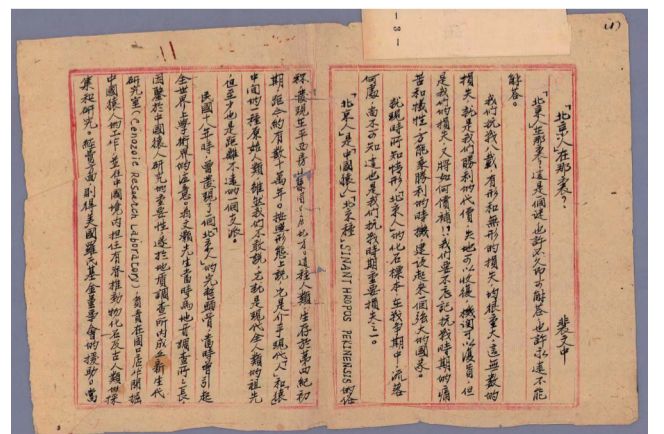
即便历经如此磨难,裴文中对祖国的赤诚与对科学的坚守从未动摇。抗

战胜利后,他继续深耕考古领域,改革周口店发掘方法,让田野操作规范达到国际一流水平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四处奔走培养考古人才,举办的四届考古训练班培养了346名骨干,被誉为考古界的“黄埔四期”。他教导学生“脑勤、手勤、眼勤、嘴勤”,以身作则带领大家扎根田野,把一生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考古事业。

1966年,花甲之年的裴文中重回周口店,再次发现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。当他将新化石与旧模型拼对成功,发现竟是同一个体时,老泪纵横——痛失化石的缺憾,终于得到了些许弥补。而当自己“北京人石器最原始”的观点被质疑,他看到确凿证据后,毅然放弃原有见解,彰显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品格。

1982年,弥留之际的前一个月,裴文中依旧握着笔勾画考察路线,他的心里,永远装着祖国的山山水水。他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家国情怀,何为学者担当。那些失踪的北京人化石,是他永远的牵挂;而他留下的科学精神与爱国赤诚,早已融入华夏大地,成为激励后人前行的宝贵财富。

(作者系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理事,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学文化专委会委员)



裴文中的寻找“北京人”在哪里手稿。(作者供图)